

#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

## 一一五年度補助案成果報告書

壹、補助案基本資料表					
受補助/申請單位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計畫名稱	2026 訪美智庫交流				
附件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傳單_件、海報_件、照片_5張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實施地點	美國舊金山	實施期間	115/3/1-3/5		
實際支出金額	1,035,330 元	實際參與活動人數	活動總人數： 男：24 女：10	貴單位： 男：5 女：2	
原預算金額	1,725,810 元	實際經費分攤情形	外交部補助：835,270 元		
貳、計畫實施成果摘述					
<p>本計畫成員在 5 個工作天中，完成與美國史丹佛大學的會議及活動並交換國際局勢看法，交流對象多達 16 位學者及 10 多位學生，而且背景多元。行程圓滿順利。</p>					
參、計畫實施情形					
<p>一、參加或主辦擬申請之國際組織會議或活動實施效益、特色及影響：</p> <p>(一) 增加國際交流並提升我國能見度情形</p>					
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達成目標值	達成度 (註 3)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增加國際交流 並提升我國能 見度	參加人數(註 1)	7	7		
	重要貴賓(註 2)	0	0		
	發表論文或座談 (倘有)				

參賽成績 (倘有)				
其他				

註 1：倘在國內辦理國際會議或活動，請填活動總人數；倘赴國外出席會議或活動，請填貴單位參加人數。註 2：重要貴賓係指國外政府官員、國際政府間組織官員、國際非政府組織具決策權之主管等。註 3：達成度請自行評定為「良好」、「普通」或「待改進」。

(二) 爭取或維護該國際組織會籍情形(請於 250 字內要述)

無

(三) 爭取擔任該國際組織主要幹部情形(請於 250 字內要述)

無

(四) 爭取該國際組織重要年會在臺主辦情形(請於 250 字內要述)

無

(五) 其他設定目標及達成情形(請於 250 字內要述)

### **INPR and Hoover Institution Closed Door Workshop**

時間：2026 年 3 月 2 日 08:15-13:00

地點：Annenberg Conference Room, George P. Shultz Building, Hoover Institution

#### **【INPR Attendees】**

**Dr. Hung-mao TIEN**, Board Chairman & President,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of R.O.C Taiwan

**Dr. Yu-jen KUO**, Vice President,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Dr. Hung-jen WANG**, Director,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Ms. Tsun-tzu Kristy Hsu**, Director of the Taiwan ASEAN Studies Center, Chung 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Taiwan

**Dr. Yen-sen Chen**, Chairman, Taiwan Innovative Space Incorporated (TiSPACE), and formerly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NSPO now Taiwan Space Agency, TASA)

**Dr. Kuo-cheng Chang**, Associate Direct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Ms. Yu-ching Wang**, Section Chie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ion, Department of Policy Plann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O.C.

### **【 Hoover Institution Attendees 】**

**Larry Diamond**, Mosbacher Senior Fellow of Global Democracy at 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nd Professor, by courtesy, of Sociology and of Political Science

**Admiral Ellis**, Annenberg Distinguished Fellow, Hoover Institution

**Kharis Templeman**,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ogram Manager of the Project on Taiwa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Chenggang Xu**,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Visiting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anc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Guoguang Wu**,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at the 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Mike McFaul**, Senior Fellow,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Ken Olivier and Angela Nomellini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Peter and Helen Bing Senior Fellow, Hoover Institution

**Stephen Kotkin**, Senior Fellow at Stanford's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irkelund Professor i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meritus at the Princet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merly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Elisa Autry**, Research Fellow at Stanford University's Hoover Institution

**Eyck Freymann**, Hoover Fellow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here he directs the Allied Coordination Working Group, Non-Resident Research Fellow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the Institute of Geoeconomics in Tokyo, and the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Rowena H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nd a historian of modern China

**Philip Zelikow**, Senior Fellow at Stanford University's Hoover Institution

**Jun Li**, Visiting schola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Liz Economy**, Hargrove Senior Fellow and co-chair of the Program on the US, China, and the World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Tom Fingar**, Shorenstein APARC Fellow, Affiliated Scholar at the 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Mark Lambert**, China Coordinator and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Laura Stone**, Former Ambassador to the Marshall Islands

### **SESSION 1**

###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Co-Chairs: Larry Diamond, Hoover Institution, and Hung-mao Tien, INPR

## Presentations

1. Kristy Tsun-tzu Hsu – Taiwan economy
2. Yen-sen Chen – Taiwan space program

Followed by moderated conversation with Hoover fellows 美

方 Larry Diamond 評論：

我在胡佛研究所參與主持「台灣與印太區域」研究計畫，並與 James Ellis 上將共同推動相關研究。本次會議也邀請台灣國策研究院及其董事長田弘茂參與交流。1990 年代中期，我們曾合作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當時台灣正完成由威權體制向民主制度的轉型。

台灣如今被普遍視為亞洲最成功的民主政體之一，但同時也面臨嚴峻的外部安全壓力。主要威脅並非來自內部政治，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升高的軍事威嚇與灰色地帶行動。

在國際安全局勢持續變動之下，中國正密切觀察美國的戰略決策、軍事能力與政治意志。台海未來發展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北京可能評估是否採取軍事行動，或持續透過灰色地帶策略加強對台壓力。

維持警戒、強化防衛準備、展現戰略決心，以及深化台美安全合作，仍是維持台海與印太區域穩定的重要基礎。

我方田弘茂院長評論：

約一年前，我曾與 Larry Diamond、James Ellis 上將及本次會議的籌辦者在台北交流。當時的討論已相當深入，但與一年前相比，今日的國際與區域情勢顯然更加複雜，需要面對的議題也明顯增加。

我長期從事學術研究，曾在美國任教與研究近三十年。1990 年，我受李登輝總統邀請返台參與籌辦國是會議，討論並推動後續的憲政改革。隨著民主轉型逐步完成，我也在 1995 年決定回到台灣長期發展。

此後，我曾參與外交部工作，嘗試在制度與政策層面促進兩岸互動。兩岸關係始終複雜且充滿挑戰，但相關對話與接觸仍具有重要意義。

我早在 1970 年代即曾赴中國訪問，當時仍處文化大革命時期，並曾與中國官員就兩岸問題進行長時間討論。這些經驗使我持續關注台灣民主發展、兩岸關係以及區域戰略環境。

當前討論台灣問題，除了民主與兩岸關係，也必須納入科技與產業因素，特別是半導體產業對全球政治經濟與安全架構的重要性。因此，本次會議也邀請科技專家參與討論。

我期待透過這次交流，就台灣與美國、中國、日本之間的雙邊與三邊關係，以及民主、科技與貿易等議題，進行開放而深入的討論。

我方徐遵慈評論：

我主要從三個面向簡要說明台灣當前的經濟情勢、台美經濟關係，以及未來合作前景。

首先，2025 年台灣經濟表現強勁，GDP 成長率超過 8%，出口成長接近 35%，創下十五年來少見的高成長。此一成長主要由全球對人工智慧與先進半導體的需求帶動，尤其來自美國市場。然而，台灣經濟也呈現明顯的 K 型復甦現象：科技產業快速擴張，但鋼鐵、化工、機械與運輸等傳統產業仍面臨中國競爭、匯率升值壓力，以及全球非科技產業需求疲弱的衝擊。

此外，川普政府的對等關稅與 232 關稅措施，也對部分台灣產品造成壓力。

其次，台灣的出口與產業結構近年出現明顯轉變。2025 年，美國已取代中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對美出口占比由過去長期低於 20% 上升至約 32%；相對地，對中國與香港出口占比則由約 43% 下降至約 20%。此一變化反映三項因素：美國科技需求強勁、中國內需疲弱，以及台灣企業供應鏈逐步自中國轉移。投資結構也出現相似趨勢，自 2023 年起，美國已成為台灣對外投資最主要的目的地。

目前台美經濟關係中最大的變數仍是關稅問題。雙方近期簽署的對等關稅協議，是目前最具規模的雙邊經貿安排之一，但仍須經台灣立法院審議通過，其政治與制度進程仍有待觀察。

最後，在產業合作方面，半導體仍是台美戰略合作的核心。台積電已宣布在美投資 1650 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建設六座先進晶圓廠、兩座先進封裝測試設施以及一座研發中心。2024 年底，亞利桑那第一座晶圓廠已開始量產 4 奈米晶片。然而，由於美國目前尚缺乏完整的先進封裝測試能力，部分晶片仍需送回台灣進行後段製程，顯示台美半導體供應鏈仍在整合過程中。

未來合作亦正擴展至其他戰略產業，例如稀土資源。台灣工研院已開發稀土萃取技術，並與美國討論合作計畫，由台灣提供技術、美國確保原料供應，以降低對單一供應來源的依賴並提升雙方的經濟安全。

我方陳彥升評論：我主要從兩個面向說明台灣在當前國際體系中的角色：一是科技產業，二是地緣戰略位置。首先，半導體產業是台灣過去三十年最重要的經濟與技術發展成果。透過長期投入與產業政策，台灣已成為全球晶圓製造的核心基地，使台灣在全球科技與產業體系中占據關鍵地位。

其次，台灣的戰略重要性亦來自地理位置。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核心節點，在當前美國以實力維持和平的印太戰略架構下，台灣在區域安全與海上秩序中具有關鍵地位。近年來，台灣

安全面臨新的挑戰，例如海底電纜遭蓄意破壞的風險，以及太空與通訊領域的潛在干擾能力。中國學界的研究甚至提出透過無人機群干擾星鏈等衛星通訊系統的構想，顯示未來衝突可能延伸至太空與資訊基礎設施領域。

因此，台灣正思考建立更具韌性的通訊體系，包括結合衛星通訊與高空長航時無人機平台，以確保在危機情境下仍能維持關鍵通訊能力。相關技術早由英國與空中巴士發展，美軍亦已進行多年測試，目前此類平台可在平流層持續運作數十日。

此外，無人機已成為強化台灣不對稱作戰能力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台灣多數無人機系統仍缺乏高階抗干擾通訊能力。近期戰場經驗顯示，低成本且具抗干擾能力的無人機系統具有重要軍事價值。因此，我認為台灣應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技術合作管道，引進相關系統與技術，以強化台灣的不對稱防衛能力。

美方 Larry Diamond 評論：

我在研究 1990 年代台灣民主轉型時，曾注意到台灣與南韓之間的一個重要差異。南韓的經濟結構高度集中於大型財閥體系，而台灣則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家活動與創新較為分散。分散型的經濟結構在當時與民主化過程形成相互支撐，也使台灣長期維持相對較低的所得不均與穩定的吉尼係數。

近年來，台灣經濟成長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大型企業，特別是半導體等核心科技產業，使整體經濟動能呈現高度集中。同時，所得與財富差距也逐漸擴大。類似的情況在美國與南韓同樣可見，顯示這已成為許多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政治經濟課題。

所得與財富集中可能影響社會凝聚力與政治穩定，也會削弱社會對共同公共目標的支持。部分年輕世代對機會分配與社會流動的前景感到挫折，相關不滿逐漸轉化為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張力。因此，我特別關注兩項問題：其一，經濟成長動能過度集中於少數企業與產業所帶來的結構風險；其二，所得與財富集中對民主政治與社會穩定可能造成的長期影響。

我方徐遵慈回覆：

我認為此問題在台灣已討論多年。近年台灣 GDP 成長、出口與人均所得皆出現亮眼數據，但此成長並未被社會各部門普遍感受，產業與階層之間仍存在明顯差距。其中一個問題是企業集中度。台積電目前約占台灣股市市值四成，半導體產業亦占台灣出口約六至七成。持有相關股票者確實受益，但非科技產業與年輕世代，特別是初入職場者，薪資長期停滯，壓力明顯增加。

政策層面長期主張產業多元化與培養新的成長動能，但半導體的重要性仍持續上升。

過去市場集中於中國。2010年中國曾吸收台灣 84%的對外投資，出口占比亦達 40%以上。但近年此依賴已明顯下降，去年台灣新增對中投資僅約 4%。然而，新的集中現象正在形成。美國已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與主要對外投資目的地，另加上台灣企業對美投資與政府提供的大規模融資保證。台灣社會普遍意識到此結構性挑戰，但如何在維持成長動能的同時降低集中風險，仍需要更長時間討論與政策調整。

美方 James Ellis 對我方徐遵慈提問：

我認為剛才的說明已相當清楚呈現台灣目前的經濟狀況。我比較關心的是政治因素如何影響台灣處理此經濟結構問題的能力。從外部觀察可見，台灣政治似乎出現一定程度的緊張與僵局。此情況在許多民主國家並不罕見，例如美國也常因政黨分歧而難以形成跨黨派共識，進而影響政策決策與執行。

因此，我想了解台灣目前的主要政治摩擦來源。此摩擦主要來自內部政黨政治，還是來自兩岸關係議題？主要政黨之間的分歧是否集中於此兩個層面？同時，國際環境正在快速變化，過去較為緩慢的政策調整節奏可能已不足以應對新的安全與經濟挑戰。

我想進一步了解台灣社會與政治體系內部是否已出現更強烈的緊迫感，以因應經濟、貿易與安全政策上的挑戰。

若確實存在此壓力，台灣的立法院是否已準備好推動相關政策？若尚未準備好，是否需要某種外部衝擊或政治契機，才可能促成政策突破？

我方徐遵慈回覆：

我先回應剛才兩位提出的問題。台灣大型企業如鴻海與台積電，早期多以中國為主要製造基地，並為美國、日本與歐洲品牌代工，因此很難完全放棄中國市場。

近年供應鏈轉移的主要原因，多半不是政策，而是市場力量。中國市場成長放緩且競爭加劇，同時美國企業要求供應鏈降低對中國依賴。許多台灣企業因此跟隨客戶調整生產布局，轉向墨西哥、越南或印度。蘋果等企業的供應鏈調整，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情況也反映企業與政府政策之間的差異。跨國經營企業多依據市場與客戶需求決策，其立場有時與政府經濟政策並不完全一致，此差異也影響台灣內部的政策討論。

另一個長期議題是尋找新的成長動能。台灣政府多年來提出不同產業政策，例如生技產業、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以及目前的五大信賴產業。但半導體產業的形成歷經近四十年累積，新產業發展同樣需要時間。

目前台灣與先進國家的合作正逐漸擴展至無人機、關鍵礦物與其他戰略產業。然而，台灣在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方面仍面臨困難，例如 CPTPP 等制度安排。

目前許多台灣企業同時參與兩種供應鏈體系：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網絡，二是以美國與西方國家為核心的產業體系。台灣目前的主要挑戰來自三個層面：內部政策調整、外部地緣政治風險，以及全球供應鏈重組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美方 David Fedor 提問：

我想延續剛才的經濟議題，提出一個觀察。過去台灣企業與技術人才在中國製造業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許多產業能力與管理經驗都來自台灣企業的長期投入。

在目前美國推動製造業回流與產業重建的政策環境下，美國也開始出現一種討論：台灣是否能在美國複製當年在中國建立製造體系的經驗。

目前此討論不僅限於半導體。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投資與量產，雖然面臨成本與人才挑戰，但整體進展仍顯示此產業聚落具有形成的可能。

因此出現一個新的問題：台灣是否可能形成一種對美投資模式，將企業、資本與技術人才一同帶入美國市場，並在當地建立產業聚落。過去日本企業在 1980 至 1990 年代進入美國市場時，也曾出現類似模式。

目前台灣對美投資規模已大幅增加，但仍需要觀察企業是否將此視為長期市場機會，以及是否能有效整合美國勞動力與產業體系。若此模式能順利發展，合作領域可能不僅限於半導體，也可能擴展至生技、無人機與稀土等戰略產業。

我方徐遵慈回覆：

2022 年我曾在台灣研究美國《晶片法案》，並訪談多家台灣與美國企業及政府機構。當台積電宣布在美國設立先進晶圓廠時，台灣社會其實相當震驚。過去台積電雖在中國與新加坡設廠，但多為成熟製程，最先進技術始終留在台灣。

因此，將先進製程移往美國在台灣引發廣泛討論。當時規劃為 7 奈米，但亞利桑那廠目前已量產 4 奈米，未來第二與第三座晶圓廠可能生產 3 奈米與 2 奈米晶片，使部分社會輿論關注台灣是否正在將核心技術轉移至海外。

另一個關注點是台積電在美國營運面臨的人才與制度挑戰，包括招募困難與勞資爭議。許多人因此觀察：若台積電此案例無法順利運作，其供應鏈企業是否仍願意跟進赴美投資。

台積電在全球供應鏈具有高度帶動能力，可吸引數十家關鍵供應商共同形成產業聚落。若台積電在美國營運順利，將有助於在亞利桑那或其他地區形成完整產業鏈；反之，供應鏈企業可能重新評估投資布局。

產業發展也顯示另一個趨勢：中國在成熟製程晶片的產能正在快速增加，因此台灣與美國未來合作將更集中於先進製程與高階科技領域，例如人工智慧晶片。目前台積電對美出口多為 7 奈米與 5 奈米晶片，未來可能逐漸轉向 4 奈米與 3 奈米。此趨勢意味著台美科技合作將更加集中於先進技術領域。

在政策層面，台美貿易協議未來仍需經台灣立法院審議。反對黨可能提出不同政策主張，例如台灣版晶片政策等議題。相關辯論將與產業政策及對美投資問題一併討論。

因此，未來台灣政府需要在國內政治辯論中建立政策共識，同時確保台積電及其供應鏈在美投資計畫能順利推動。

我方陳彥升補充：

企業投資決策本質上仍以利潤為核心。台積電在評估海外投資時，也必然比較台灣與亞利桑那的獲利條件，因此成本與營運環境仍有改善空間。

美國投資涉及較高的人力與營運成本，但關稅政策也為部分產業提供新的投資誘因。對資訊科技與傳統製造業而言，在美國設廠可降低關稅壓力，此因素也推動部分企業增加對美投資。

然而，大型企業的產業布局具有高度慣性。許多台灣企業在中國仍擁有上萬名員工，要將此生產體系轉移至東南亞、印度或美國，需要長時間規劃。企業在調整供應鏈時必須同時考慮成本、投資報酬與股東利益，因此轉移過程必須避免影響企業獲利。

因此，雖然地緣政治因素正在促使企業逐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但如何在維持企業競爭力的前提下完成此轉移，仍是企業決策的主要考量。

美方 Elisa Autry 提問：

目前在美國不同地區對科技與安全議題的關注有所差異。華府政策圈較關注戰爭與安全風險，而矽谷與灣區則更多討論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已進入日常公共討論，企業高階主管、科技人才與資料中心產業皆直接受到此技術影響。

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在推動人工智慧發展的同時維持「以人為本」的技術治理。台灣政府近年提出「可信任人工智慧」與「可靠人工智慧」的政策理念，因此我關心台灣是否能在此領域分享政策與治理經驗。

此問題涉及如何在技術創新與社會價值之間取得平衡，也關係到人工智慧治理模式的制度設計。人工智慧亦逐漸成為中國對外科技外交的一部分。中國透過向全球南方提供較低階的人

工智慧晶片與技術，擴展其科技影響力。我也想了解台灣是否可能在全球科技合作中扮演更積極角色，透過自身技術能力與產業優勢，深化與國際社會的合作。

我方徐遵慈回覆：

在台灣，多數政府與產業部門將人工智慧視為一項新興產業。此產業被視為半導體之後的重要成長動能，且與晶片產業高度連動。過去兩至三年全球人工智慧需求快速成長，台灣亦從中受益。

部分國家擔心人工智慧可能取代勞動力，但在台灣此議題的社會壓力相對較小。台灣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與人口老化，因此人工智慧多被視為補充人力的重要工具。

台灣企業其實早在十多年前便開始在製造業導入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系統。目前此技術也逐漸擴展至醫療、服務與餐飲等領域，以補足人力不足問題。

政府近期推動《人工智慧基本法》，在制度設計上結合歐盟與美國的治理模式，將促進社會對資料隱私與人工智慧治理議題的討論。台灣對人工智慧的政策定位仍以產業發展與勞動力補充為主，因此在治理與倫理層面的討論，相較部分先進國家仍較為審慎與漸進。

美方 Leo He 提問：

台灣目前面臨所得與財富集中，以及非科技產業與基層勞工薪資停滯的問題。同時，台灣生育率已降至全球最低，人口老化速度也相當快速。我想請教台灣政府如何調整相關政策。例如，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是否被視為重要因應方式？

此外，在移民政策與外籍勞工政策方面，政府是否已有新的制度規劃，以回應未來的人口與勞動市場挑戰？

我方徐遵慈回覆：

台灣人口老化與勞動力短缺問題長期受到討論。相關政策主要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規劃，但在推動外籍勞工政策時，仍面臨部分勞工團體的壓力，因此政策調整速度較慢，也經常受到產業界批評。

目前台灣人口約 2300 萬，外籍勞工約 70 萬至 80 萬人。相較之下，馬來西亞人口約 3000 萬，但外籍勞工總數超過 500 萬。可見台灣外籍勞動力比例仍然偏低。勞動力不足已直接影響服務業與餐飲業運作。例如部分知名餐廳週末不營業，原因並非需求不足，而是缺乏人力。

此情況同時反映台灣產業結構壓力。台積電在台灣使用大量綠電、水資源與高階工程人才，產業集中程度相當高。因此，部分企業界人士認為台積電部分產能轉移至美國，反而可能釋放台灣的人才與能源資源，使其他產業有更多發展空間。

我方陳彥升補充：

人工智慧與自動化技術正在改變全球製造模式。過去企業將生產轉移至中國，主要原因是勞動成本優勢；然而，人工智慧與機器人技術正在降低勞動成本的重要性，因此未來工廠選址的決定因素可能出現變化。

在人工智慧產業鏈中，台灣與美國形成高度分工。人工智慧晶片如 GPU、CPU 與 TPU 多由美國企業設計，而台灣則負責先進晶片製造。此分工使台美科技合作形成高度互補關係。

美方 Chenggang Xu 提問：

我想請教關於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情況，此處的機器人包括無人機等相關技術。此議題同時涉及國家安全與全球供應鏈兩個層面。目前例如 Tesla 在機器人供應鏈方面正與中國產業合作，因此我想知道台灣在此領域的整體發展狀況。

具體而言，台灣在機器人與無人機產業的技術能力、政策支持與研發體系（例如工研院）目前處於何種發展階段？台灣未來的發展前景與政策方向為何？

我方陳彥升回覆：

在半導體產業中，晶片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先進製程晶片，例如 4 奈米、3 奈米及更先進製程。此類晶片主要應用於人工智慧，需要高效能與低能耗，目前主要由台灣與美國亞利桑那州生產。

第二類是成熟製程晶片。此類晶片廣泛應用於機器人、武器系統與飛彈等領域，因此在產業與安全層面同樣具有關鍵性。

目前成熟製程晶片供應鏈相當程度集中於中國，此也是部分企業（如 Tesla）依賴中國供應鏈的重要原因。

若從國家安全角度觀察，此供應結構值得關注，因此相關政策可能需要在成熟製程晶片領域建立更明確的產業與安全規範。

美方 Leo He 提問：

目前全球科技與安全格局似乎可由三個 W 來理解：晶圓(Wafers)、能源(Watts)與武器(Weapons)。先進半導體固然重要，但僅是整體科技體系的一部分。

除了先進晶片之外，記憶體晶片、各類電子元件與先進材料同樣構成完整產業鏈，而此供應體系並非由台灣單一主導。南韓在記憶體產業具有重要地位，例如 Samsung；日本則在先進材料領域扮演關鍵角色。

因此，我想請教台灣目前如何定位自身在整體科技供應鏈中的角色。台灣是否正嘗試擴大在人工智慧產業鏈中的整合能力，或是進一步集中於最先進製程技術？

同時，在南韓等國快速追趕的情況下，台灣如何評估此競爭態勢？

我方陳彥升回覆：

在記憶體晶片領域，製程縮小仍是提升儲存容量與效能的關鍵。例如目前 USB 裝置可達 1TB 容量，主要來自晶片製程持續微縮。

目前南韓在記憶體產業仍具重要地位，但在先進製程品質方面仍與台積電存在差距。這也是台灣在先進晶片製造領域仍保有競爭優勢的原因。然而，此優勢未必長期維持。其他國家持續投入研發，未來仍可能逐步追趕。

在技術發展上，製程微縮最終可能接近 1 奈米的物理極限。因此，台積電目前正積極投入下一代晶片技術研究，以探索 1 奈米之後的新製程與技術方向。

美方 David Fedor 提問：

我想提出兩個觀察，請教各位的看法。

第一個問題涉及半導體供應鏈風險。目前美國對中國半導體供應鏈的依賴程度仍缺乏完整掌握，特別是在成熟製程晶片方面。雖然美國政府已嘗試評估此問題，但目前仍未形成清楚的政策框架，因此此可能構成潛在脆弱性。

台灣長期面對中國供應鏈風險，因此在相關風險評估上具有較多經驗。我想請教台灣是否已建立相關策略或制度，並且是否存在台美合作空間，以共同強化供應鏈安全。

第二個問題涉及供應鏈中斷情境的政策準備。目前美國企業對於重大地緣政治衝擊情境的規劃仍相對有限，多數企業尚未系統性思考供應鏈中斷時的市場與產業調整策略。

部分國家在此方面已有較完整制度。例如芬蘭政府會定期與企業領導人討論危機情境，模擬可能的安全與經濟衝擊，並提前規劃因應方案。

因此，我想了解台灣政府與企業之間是否已存在類似討論機制。同時，台美企業與政府是否可能建立更制度化的合作平台，以共同評估供應鏈風險並進行情境規劃。

我方徐遵慈回覆：

2022 年疫情期間全球晶片供應中斷後，許多國家開始關注台灣在出口管制與供應鏈管理方面的經驗。雖然台灣與中國地理與經濟往來密切，但仍建立一定程度的投資與貿易限制制度。當時台灣與美國、歐洲、日本與南韓進行多次政策交流。

三年前台灣修訂《國安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首次對經濟間諜行為設立較嚴格刑責，適用對象包括中國、香港與澳門。此法亦要求接受政府補助的企業或研究機構，在派遣高階主管與工程師赴中國前必須向政府申報。

此制度已實施兩年以上，但其對技術保護的實際效果仍需持續觀察。近年亦出現多起技術外流案例。例如台積電工程師被控向日本企業洩漏技術，亦有台積電前高階主管離職後攜帶大量技術資料並轉任其他企業。技術外流風險不僅來自中國，也可能來自日本、南韓或美國企業。因此，台灣政府與企業開始更加重視技術與產業機密的保護。

台積電內部則認為其競爭力並非來自單一技術，而是整體製造能力與長期累積的產業知識，因此對個別技術外流的影響相對保留。然而，由於台積電在台灣經濟與科技體系中的重要性持續提升，如何保護核心技術並維持產業優勢，已成為台灣政策與社會討論的重要議題。

未來包括先進製程是否持續在台灣生產，例如 2 奈米技術布局，相關議題仍可能進入立法院與公共政策討論。

美方提問：

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首先是關於台灣的安全戰略。除了持續提升防衛能力與深化台美安全合作之外，台灣是否曾討論建立某種區域性的集體安全機制？目前東亞地區其實缺乏類似北約的制度性安全架構，但在面對中國與北韓等潛在軍事威脅時，是否可能由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澳洲等國共同建立某種區域安全合作體系？

即使台灣在國際主權承認上面臨限制，是否仍存在某種制度性參與空間，例如透過國防透明化或其他制度安排來降低政治阻力？此機制也未必必須由美國主導，或許可以由區域國家共同推動，美國在後方提供支持。台灣內部是否曾出現過類似「亞洲版集體安全體系」的政策討論？

第二個問題與台灣國內政治有關。目前台灣政治長期由藍綠對立主導，但近年似乎出現一些新的政治變化，例如部分選民不再完全認同傳統的藍綠分界，例如邀請王金平擔任行政院長。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是否可能出現某種跨越藍綠對立的政治發展，例如透過跨黨派合作或新的政治聯盟，形成較為穩定的政策共識？台灣是否存在這樣的政治空間，或相關討論？

我方陳彥升回覆：

此建議確實具有創意，但目前台灣政府的安全戰略仍以強化與美國及日本的合作為核心。日本在區域安全中的角色近年逐漸提升，對區域穩定具有正面作用，但日本在安全政策上仍需面對憲法上的限制，因此相關安全合作仍需要時間發展。

在台灣內部，此類安全議題其實長期在媒體與公共討論中持續出現。社會普遍關注台灣應採取何種安全路線，也會從政黨立場與政策選擇來觀察相關發展。部分政治立場若被認為過於接近中國，往往會影響其社會支持度，顯示台灣社會對安全威脅具有一定敏感度。

整體而言，多數政策討論仍認為維持和平的關鍵在於強化自身防衛能力，同時深化與美國、日本及區域夥伴（例如菲律賓）的安全合作。此種合作被視為維持區域嚇阻與穩定的重要基礎。

美方 Mark Lambert 提問：

我想提出一個結合科技、安全與外交層面的問題。過去多年，美國在說明台灣重要性時，通常強調兩個面向：其一是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關鍵地緣戰略位置；其二是台灣作為一個活躍民主社會的重要價值，即一個民主社會面對強大鄰國壓力的處境。

近年來，討論焦點似乎逐漸轉向另一個面向，也就是台灣在全球經濟與科技體系中的角色。早上討論曾提到相關研究指出，若台海發生衝突或灰色地帶衝突升高，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數億美元的衝擊。近期《紐約時報》的報導也指出，若台海局勢惡化，中國自身經濟同樣可能承受巨大成本。因此，我想請教：強調台灣在全球繁榮與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是否是一種有效的國際論述策略？如果確實如此，我們是否可以更有效地向國際社會說明此重要性？

我方徐遵慈回覆：

我需要補充說明先前提到的議題。台灣社會對於 2 奈米與未來更先進製程移往美國的討論，其實不只是產業或投資問題，而是與台灣安全直接相關。台積電的全球布局一直與台灣安全地位連動，因此社會普遍將其視為「矽盾」的一部分。

若台積電將大量先進產能轉移至美國，例如未來有 30%至 40%的先進晶片在美國生產，部分人擔心台灣在全球科技體系中的戰略重要性可能下降，進而削弱「矽盾」效應。因此，此議題在台灣往往被視為安全問題，而不只是企業投資決策。政府與智庫需要向社會說明，即使台積電在海外設廠，台灣在全球科技與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仍然重要。台灣的安全與繁榮不能只依賴單一企業，而應建立更全面的國家發展基礎。

因此，我個人其實更認同另一種論述方式：強調台灣對全球繁榮與科技體系的重要性，而不只是將台灣定位為必須被保護的「砒盾」。

同時，台灣社會也關注美國政策的持續性。例如蔡英文政府與拜登政府曾推動 21 世紀貿易倡議，但後續政策變動也引發部分疑慮。未來美國政府是否持續重視與台灣的經貿與安全合作，也是台灣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

從經濟與貿易分析的角度來看，近年台灣與多個理念相近的先進國家確實出現前所未有的雙邊關係改善。然而，此種政治信任與合作氛圍，目前仍未完全轉化為對台灣具體且實質的制度性成果。例如台日關係被普遍視為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日本在公開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一事上仍然相當謹慎。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歐盟與美國。台灣外交部與相關部門長期與這些國家討論經濟安全與戰略自主等議題，但在部分國際合作機制中，台灣仍難以正式參與。例如美國、歐盟與日本曾討論建立關鍵礦物合作機制，形成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網絡，但台灣仍未被納入，即使該機制本身僅屬較鬆散的合作平台。

因此，台灣目前的期待是，既然雙邊關係與合作程度持續提升，未來此種政治信任應能逐步轉化為更具體的制度性成果，例如在國際經貿機制中的參與機會，以及更廣泛的國際合作空間。

## SESSION 2 Security and Defense

Co-Chairs: James O. Ellis, Hoover Institution, and Hung-mao Tien, INPR

### Presentations

1. 張國城—PLA
2. 王宏仁 Hung-jen Wang – Cross-Strait relations
3. 郭育仁 Yu-jen Kuo—Defense Policy

美方 James Ellis 評論：

我想回到今天這場討論一開始提出的那個問題：台灣是否能在動盪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繼續穩健航行。作為一名海軍，我很喜歡用航海來比喻這個問題。

三十年前的這個星期，我正帶領航空母艦戰鬥群從馬尼拉出航，當時接到國防部長 **William Perry** 的指示，前往台灣附近海域，向外界傳達美國對區域局勢的關切與決心。那正是 1996 年台海危機最緊張的時刻，中國每天向台灣周邊海域發射彈道飛彈。我後來才知道，中國方

面甚至注意到我的旗艦名字「獨立號」(USS Independence)。雖然這只是巧合，但它象徵了美台關係長期以來的深厚連結。

過去幾十年，這種關係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隨著台灣成功走向民主而更加深化。因此我的問題是：未來台灣要如何不僅維持與美國的夥伴關係，還能在國防與安全領域進一步強化這種合作？在你看來，未來要持續深化這段長達數十年的合作關係，最關鍵的幾個要素是什麼？

我先說明，在胡佛研究所討論安全議題時，我們通常採取比較廣義的理解方式。安全不只涉及軍事，也同時包含經濟、地緣政治與能源等面向，因此這些問題很難彼此分開。正因如此，討論往往很快就會從軍事或技術議題，延伸到國際關係、夥伴合作與聯盟體系等更廣泛的問題。

很多人常說不會出現「太平洋版的北約」，但我認為仍值得思考為什麼不可能。這並不代表那一定是答案，而是因為目前整個戰略環境正在快速改變，許多過去被視為固定不變的假設，其實都需要重新檢視。

我現在其實已經不太使用「現狀」這個詞，因為在我看來，現狀早已不存在。這讓我想到多年前在航空母艦上的一次經驗。當時夜間準備起飛，能見度很低，兩側的飛機同時往前移動，我一度以為是自己的飛機正在往後滑、快要掉出甲板。後來才發現其實是周圍的飛機在移動，而不是我在動。

就如同這個經驗，很多變化其實是相對的。當整個環境都在改變時，很容易誤以為只有自己在移動。因此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如何維持所謂的「現狀」，而是如何在不犧牲原則、不削弱重要夥伴關係與經濟科技實力的前提下，調整策略以回應新的環境。

我方田弘茂院長評論：

我先補充幾點觀察。近年談到台灣時，討論常常集中在台積電，甚至出現「台灣等於台積電」的印象。但從企業角度來看，台積電本身也面臨一些結構性問題。首先是人力資源。台灣人才規模有限，當公司在海外設廠時，從選址、設計到建廠與營運，都需要大量經驗豐富的管理者與工程師，而這類人才供給本來就不充足。其次是基礎資源問題，例如電力與水資源供應，這些因素也促使企業考慮海外布局。此外，在美國投資還需要面對不同州的法律制度、勞動法規與工會問題，企業需要具備相關專業能力來處理。

另一個挑戰來自企業文化。台積電經營已接近半個世紀，在台灣形成一套高度成熟的運作模式。這種模式與台灣的產業聚集與人口密度有關，一旦設備出現問題，各種工程與維修人員可以在短時間內到場處理，使生產迅速恢復。這種運作條件在其他國家很難完全複製，因此海外設廠即使成功，效率仍可能與台灣不同。

我也提醒一點，台積電是一家總部設在台灣的跨國公司，股東與董事會中有相當比例的外國投資者。企業決策自然會受到國際市場與安全環境的影響。

最後，我想提出幾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首先是未來美國政府對台政策的方向，特別是在川普政府之下，美台關係可能出現哪些變化。其次是台日關係。隨著日本新政府上任，台日之間在安全、經濟與科技合作方面是否會進一步深化。進一步來說，也許可以思考美國、日本與台灣之間是否存在某種三方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在經濟、高科技甚至部分安全領域。最後，還有兩岸關係的問題。近期中國對台政策似乎出現一些操作層面的調整，但是否代表更深層的战略變化，仍值得觀察與討論。

我方張國城報告：

從決策理論來看，所謂「理性」具有相對性。某個行為對行動者 A 可能是理性的，但在行動者 B 看來卻可能完全不合理。因此，在分析 2026 年解放軍軍力發展時，我們不能只用自己的邏輯去理解北京的決策，而必須從習近平的視角來理解其判斷，包括政權安全、歷史使命與國家復興等因素。

從我的觀察來看，中國目前正處於一個重要轉折點。習近平認為「東升西降」，並且相信解放軍在第一島鏈已逐漸取得優勢。同時，中國軍事與政治體系中的整肅行動，也削弱了不同意見的存在。當領導人的自信上升，而制度內部的制衡機制減弱時，誤判的風險便會增加。習近平可能相信解放軍已具備發動行動的能力，即使實際情況未必如此。

如果習近平認為西方決策出現猶豫或窗口期，他可能會將行動視為合理選擇。對他而言，經濟制裁的成本可能只是次要因素，因為其決策邏輯更接近政權存續與歷史任務，而不是市場計算。

因此，台灣防衛問題不能只用飛彈數量或軍力比較來衡量，更關鍵的是嚇阻。策略的核心在於讓習近平相信，攻擊台灣不會帶來民族復興，而可能導致他最擔心的結果，例如中共政權控制力的削弱。換言之，我們需要在其戰略判斷中注入不確定性，讓他意識到對手的決策速度更快、體系更具韌性，並且具有足夠的決心與能力維持嚇阻。

我方王宏仁報告：

主持人在開場時提到，他認為「現狀」(status quo) 已不足以描述當前台海局勢。不過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我想集中討論一個核心問題：究竟是誰在改變台海現狀？或者說，目前台海的實際狀況是什麼？我想提出三點觀察。

首先，在政治層面，北京已拒絕與台灣民選政府進行正式溝通，並要求台灣接受「九二共識」作為對話前提。但北京對九二共識的解釋，實際上與「一個中國原則」甚至「一國兩制」逐漸連結，而這一模式在台灣社會普遍遭到拒絕。以此作為前提並拒絕對話，本身就是



對既有互動模式的改變。過去某種程度的「建設性模糊」仍能維持兩岸功能性互動，但這種空間如今已逐漸被北京關閉。

第二，在歷史與法律敘事上，中國近年持續推動新的歷史論述，例如強調「抗戰勝利八十週年」並據此強化對台主權主張。同時，北京將《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解釋為已將台灣主權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必須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當時尚未成立，也沒有任何戰後條約正式將台灣主權移交給北京。

第三，在軍事層面，我們看到脅迫行動逐漸常態化。解放軍演習越來越多模擬包圍台灣的情境，灰色地帶行動、海空侵擾、網路攻擊與政治影響操作也日益頻繁。過去屬於例外的行動，正在變成日常狀態，這種逐步常態化的壓力正在改變台海的戰略基準。

美國長期政策強調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並支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如果中國正透過政治壓迫、歷史敘事與軍事壓力改變現狀，那麼問題便在於美國是否會依據自身原則作出回應。今年四月可能舉行川習會，台灣社會對美國承諾的討論也日益增加。我認為，美國未必需要升高衝突，但確實需要更清晰的立場。戰略模糊不應變成戰略沉默，而與中國的接觸也不應被解讀為對其對台脅迫行為的默許。

我方郭育仁評論：

我想傳達的訊息其實很簡單，主要涉及台灣國防政策與當前面臨的幾個問題。首先是國防預算。賴清德總統目前推動提高國防支出，希望核心國防預算達到 GDP 的 3.5%，另外再加上約 1.5% 用於更廣義的安全支出。資源主要集中在四個方向：提升台灣的不對稱作戰能力、強化整體防衛韌性、應對中國的灰色地帶行動，以及重建後備動員體系。

在軍事能力建設方面，政府近年強調發展不對稱戰力，例如整合防空與飛彈系統、發展精準打擊能力，以及強化 C4ISR 指揮與資訊系統。不過在軍方內部仍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特別是部分陸軍體系仍傾向傳統大型武器系統的採購，例如潛艦或大型艦艇等。

台灣國防目前也面臨幾個結構性問題。第一是國內政治因素與中國的影響行動，使部分國防政策在立法院面臨阻力。第二是軍事教育與歷史敘事的問題，部分軍事院校的教材仍保留過去的歷史觀，與當前安全環境之間存在落差。第三是區域安全合作仍然有限。台灣與日本之間雖然在網路安全、情報交換與海巡合作方面有所發展，但整體合作範圍仍然不大，與菲律賓等國的安全連結也仍有待加強。

最後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滲透行動。這種滲透已從過去較集中、較高層的行動，逐漸轉向更分散的方式，目標包括基層軍官與士兵。例如在部分軍營周邊，甚至出現以放貸方式接近軍人的情況，並試圖交換情報。這些行動顯示滲透活動已延伸到基層層級，使政府在防範與追蹤上面臨更大的困難。

美方許成鋼評論：

這個問題其實與郭教授剛才提到的情況非常相關。幾個月前，我們參觀了一個博物館，也就是張學良的故居。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參訪，但進去之後我們都非常驚訝，因為館內的歷史敘事幾乎完全採用中國共產黨的版本來描述相關事件。

後來我們特別去查了一下這個博物館的背景，才發現它其實是由中國遼寧省出資建立的。這就讓人產生一個很大的疑問：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在台灣發生？為什麼沒有被禁止？不論哪一個政黨執政，為什麼台灣會允許中國共產黨在台灣設立這樣的博物館？

我方提問：

國與台灣曾經就 TSMC 投資達成某種共識，承諾對美國進行前所未有的直接投資。那次討論之後，我曾與一群台灣年輕學生交流，他們當時說了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他們說：「我們終於又有一種『亞洲孤兒』的感覺。」

他們的意思是，一方面台灣面臨來自中國的壓力，另一方面又擔心美國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放棄台灣，除非台灣能提供像晶片這樣的重要資源。他們感覺自己好像只能依靠 TSMC、依靠晶片與資金來換取安全。這種情緒在部分年輕世代中其實帶有一種悲觀感，好像如果沒有晶片、沒有資金，台灣就沒有足夠的籌碼來維持自身的安全。

另外一個問題與歷史敘事有關。剛才提到中國正在重塑歷史敘事。我自己在課堂上也會教抗戰史與近代中國史，但我注意到，北京近年在這方面的敘事變得非常強勢。例如習近平主持的大型閱兵與紀念活動，就重新塑造了整個抗戰歷史的詮釋。在某種程度上，國民黨似乎逐漸放棄了這部分的敘事主導權，使北京得以利用這些歷史議題來建立自己的政治敘事。

因此我想問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應該如何處理歷史敘事與國內輿論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當部分年輕世代同時面對中國的壓力，又對美國的承諾產生疑問時，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建立一種更有信心的社會敘事？

美方 James Ellis 評論：

在這個時代，對抗假訊息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一環。幾乎每個國家都在面對這個問題，美國也不例外。不過在台灣，情況可能更加複雜，因為中國在資金、媒體以及各種影響管道上的存在相當明顯，再加上現在人們獲取資訊的方式早已改變，不論是年輕世代還是像我這樣較年長的人，很多新聞都是透過新的媒體平台接觸到的。

問題不只是外界對台灣的看法，更重要的是這些訊息逐漸在社會中形成一種「現實感」。多年來，北京一直在傳遞同一套敘事：美國的對外關係是交易式的、可變動的。從過去幾十年

---

---

的政策變化，到比較近的例子，例如阿富汗撤軍，這些事件都被拿來當作證據，強化這種說法。

上次我們到台北與一些意見領袖交流時，也從許多在網路與媒體領域工作的年輕人那裡聽到類似的觀點。因此問題變成，我們要如何回應這樣的敘事？坦白說，能做的或許只有一件事，就是用事實與清楚的敘事來回應。對所有民主社會而言，這都是一個持續而艱難的挑戰。

我方張國城評論：

各種敘事戰與資訊戰其實非常難處理，尤其是在台灣。部分媒體機構與公司確實會接受來自中國的資金，這使整體資訊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同時，社會內部對歷史敘事也存在不少爭論，例如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應該如何詮釋，以及未來的國家方向應該如何理解，這些問題往往讓整體討論顯得相當混亂。

對年輕世代來說，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台灣民主化歷程的了解其實不夠深入。很多人並沒有充分接觸到台灣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的歷史背景，因此在面對各種資訊與敘事時，容易感到困惑。

整體而言，台灣目前在多個層面都面臨來自中國的影響與壓力，無論是在媒體、歷史敘事，還是社會輿論上，都可以看到相關影響。

我方郭育仁評論：

在假訊息問題上，台灣的情況其實比很多國家更困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台灣與中國使用幾乎相同的語言，資訊可以非常容易地跨越邊界流動，再加上兩岸之間本來就存在各種政治與社會連結，使中國的資訊操作更容易進入台灣社會。

政府其實也在思考一些教育與政策上的回應，例如加強媒體識讀或設計教材，提醒年輕世代辨識假訊息。但在立法院中，國民黨與民眾黨對相關法案多半持保留態度，使得一些政策難以推動。

更困難的是，這些假訊息往往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在社會中流傳，尤其是在社群媒體環境中，很容易影響到年輕世代。有些內容甚至荒謬到像是教小孩受傷時不用看醫生，只要用口香糖貼在傷口上就好，但這類訊息仍然會在網路上擴散。看似荒唐的內容，如果長期反覆出現，也可能對年輕人的判斷造成影響，因此已經成為教育與社會層面的一個嚴重問題。

我方王宏仁評論：

---

到目前為止，現場觀眾提出的許多問題，其實都和前一場討論有關。我記得 Mark 剛才問過

一個問題：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是否過度強調自己的特殊性？我認為，台灣確實面臨一些比較

特殊的挑戰，例如假訊息與資訊戰，但同時台灣也希望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其他國家，因為許多國家其實也正在面對類似的問題。台灣政府近年一直在向外界說明，中國如何對台灣進行混合戰，包括資訊戰與輿論操作，而這些現象其實在日本、南韓以及歐洲國家也逐漸出現。透過這樣的交流，台灣與其他民主國家之間也建立了更多合作與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不只是台灣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威權體制與民主國家之間的一種更廣泛的挑戰。

至於年輕世代的問題，我認為情況也比較複雜。年輕人和我們一樣，會從不同管道獲取資訊，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資訊來源。對於一些非正式的網路平台或境外媒體，政府確實嘗試採取措施，例如限制部分具有風險的平台。但在教育體系中，政府也希望透過更長期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教育部近年與相關部會合作，希望在學校教育中提供更多關於中國、兩岸關係以及當前國際情勢的內容，讓學生從高中到大學能夠接觸不同觀點，進而更全面地理解這些議題。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台灣的政治環境與過去幾屆政府相比確實有所不同。現在國會的政治結構更加分裂，某種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僵局。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政策在立法院難以推動，理性的政策討論空間也受到限制。有些情況下，反對黨甚至會阻擋政府提出的政策方案。當這些政治衝突與北京推動的歷史敘事結合，例如「抗戰勝利八十週年」這類論述，就可能在台灣社會內部產生更大的影響與爭議。這也是目前台灣政治與資訊環境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美方 James Ellis 評論：

正如我在開場時提到的，台灣周圍的世界正在快速變化，而台灣如何回應這些變化，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一直支持由台灣自己提出解決方案。正如我一開始開玩笑說的，這應該是一個「台灣自己的方案」，而不是外界單方面替台灣做決定。

但同時，時間其實也在流逝。現在立法院的僵局，例如國防預算難以通過，或相關政策推動受阻，從外部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很容易被解讀為台灣社會沒有完全理解目前情勢的嚴峻程度，或沒有意識到問題的緊迫性。

我並不是在對各位說教。我相信你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其實非常清楚，我也很肯定各位努力把這些訊息傳達給台灣社會。但現實是，國際環境不會等待台灣的政治辯論慢慢得到解決。

我方評論：

長期以來，大中國式的教育其實是台灣的一種歷史遺產。畢竟台灣的正式國名仍然是「中華民國」，過去的教育體系也希望把台灣塑造成中華文化的重要代表，因此在學校裡非常強調中國歷史、文化與相關內容。



---

但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這樣的教育傳統在某種程度上也帶來了一些混亂。另一方面，台灣

的民主制度確實是成功的，但憲政體制本身仍存在一些制度上的弱點。例如總統沒有像美國總統那樣的否決權，也沒有像日本首相那樣解散國會的權力。因此，如果總統與立法院多數屬於不同政黨，就很容易出現政治僵局。

在我看來，北京其實相當清楚台灣政治制度的這些結構性弱點，也理解台灣教育與歷史敘事中的複雜背景。習近平的戰略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利用這些內部條件，而不只是依靠軍事壓力或飛彈威脅。

美方 Leo Spaeder 提問：

我研究台海危機這個問題大約已經八年了，最近兩年則在日本沖繩，直接從區域安全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育仁剛才提到「頑固的將領」，這一點我其實非常有感觸。

如果今天我是國防部長，我可能會購買與目前不同的裝備。但現實情況是，台灣也必須維持與美國的安全夥伴關係，而美國同時也非常重視自己的國防產業。對許多美國總統來說，他們熟悉並推廣的是「美式作戰方式」，例如戰鬥機、坦克或高端飛彈系統。

因此問題就在於：台灣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需要購買真正符合自身防衛需求的裝備，例如更符合不對稱作戰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維持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使美國仍然是台灣最重要的安全夥伴與武器供應來源。你們怎麼看這樣的平衡？台灣又應該如何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找到合適的做法？

我方郭育仁回覆：

目前在台灣軍事體系內部，關於國防發展方向的辯論其實仍然相當激烈。一個核心問題是，台灣應該更強調自主國防能力，發展本土軍事產業與裝備，還是繼續以向美國採購為主，維持美國作為最主要的安全夥伴與武器來源。這個問題在軍方內部與政治圈的看法其實並不完全一致。

在政治層面上，民進黨政府一直嘗試推動軍事轉型。例如蔡英文總統在第二任期時，曾努力改變軍方的思維，希望將陸軍逐步轉型為更適合不對稱作戰的部隊。不過這樣的改革在軍方內部確實遇到不少阻力，一些將領對改變既有作戰觀念仍然相當保留。現在在賴清德總統任內，這樣的轉型仍然在持續推進，但可以說是一場新的博弈。

另外我也想補充一點與社會情緒有關。今天早上大家提到年輕世代的經濟壓力，例如低薪與高房價確實讓許多年輕人感到挫折。不過這種不滿情緒並不一定會直接轉化為對特定政黨的支持，例如國民黨或民眾黨。從過去幾次選舉來看，我們反而看到年輕世代的投票率逐漸下降。這種情況很可能在今年的地方選舉，以及三年後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中繼續出現。

美方 Eyck Freymann 提問：

討論非常精彩，我也大致同意剛才提出的許多觀點。我只想提出一個比較宏觀的思考。從歷史上來看，美中關係很少像現在這樣緊張，但同時兩國領導人卻都持續對外表示雙邊關係其實是好的。這種落差在分析上其實非常令人困惑。幾週後可能會舉行川習會，但目前看起來似乎沒有太多實質議題。川普政府似乎還沒有明確知道自己希望從北京得到什麼，而北京也不太清楚自己能向川普政府提供什麼。即便最近的伊朗事件讓北京似乎有機會退出這場會面，但目前看來會面仍然會照計畫進行。

因此我在想，公開說法與私下溝通之間，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例如川普在去年十一月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習近平與其幕僚在私下會談中表示，在川普任內不會採取任何行動，而川普也暗示習近平其實知道，如果真的發生事情，美國會如何回應。這似乎意味著，在私下層面，美方可能傳達了比公開場合更清楚的訊號。

另一個我們其實不太了解的部分，是美國在台灣防衛方面的一些具體合作，例如軍事訓練或其他特殊支援計畫。去年有國會聽證會提到，美國在台灣軍事訓練人員數量可能比外界過去認知的多出十倍以上。這讓人不禁思考，美國政府是否其實是在爭取時間，一方面避免公開升高衝突，另一方面透過較低調或非公開的方式回應中國的灰色地帶壓力。

如果這種情況確實存在，那麼問題就在於宣傳與政治效果。若美中之間維持某種表面的緩和，北京很可能會將此解讀為美國「犧牲台灣」來換取穩定，並在宣傳上大力強調這一點，尤其是在峰會之後甚至整個年度的輿論操作中都可能如此。

因此我想請教各位，你們是否認為這樣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如果確實如此，這種情況會對台灣國內政治以及社會士氣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方郭育仁評論：

我認為，美國應該重新思考目前這種相對消極的策略，尤其是在面對中國對南韓、日本、台灣以及菲律賓所進行的灰色地帶行動時。這種策略的目的，是避免與解放軍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但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其實已經相當熟練地運用這種灰色地帶戰術。

透過這些行動，中國逐漸建立起對戰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同時在不觸發全面衝突的情況下，對台灣施加持續壓力。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重新評估目前的應對方式，考慮採取更積極、更

具針對性的策略來回應中國的灰色地帶行動，而不是長期維持目前這種較為被動的處理方式。

美方 Philip Zelikow 評論：

我想提出四點簡單的觀察。第一，我今天在這裡的角色其實主要是聆聽各位台灣朋友的想法。確實有不少人一直在研究如何實際處理這些問題，但今天這個場合與時間都不適合深入談那些政策細節。我只是想說，我們沒有多談，不代表我們不關心。

第二，川習會以及最近的伊朗戰爭，都改變了整體背景。中國可能仍然希望峰會進行，並在會談中強調彼此應該理解對方的行動。同時，這場戰爭也讓國際環境的風險感上升，人們開始更習慣於看到國際政治中的衝突與武力。有人認為美國在伊朗的強硬行動會強化對台嚇阻，也有人認為可能削弱嚇阻，目前其實很難判斷。

第三，我想提醒一個歷史上的現象：外界常常假設一個國家的利益或領導人的想法是固定的，但事實上這些判斷往往會在很短時間內出現巨大變化。現在其實有很多因素正在影響中國的判斷，例如 AI 競爭、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美國軍事準備的進展，以及美國在關鍵產業與資源上的調整。這些因素都可能改變北京對局勢的評估。

最後舉一個例子，就是「戰略模糊」。在美國政策圈，幾乎每個人都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立場。我自己過去其實支持戰略模糊，但現在也開始懷疑這個政策是否仍然合適。不過就現實來看，我不認為川普政府會在這個問題上改變立場。如果真的要改變，通常需要國會支持，但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這其實很難做到。

我方田弘茂院長總結：

第一點是關於台灣的民主轉型。不管怎麼定義，台灣的民主化其實是成功的。政權已經歷經多次和平輪替，也沒有出現大規模暴力衝突。這是一個重要成就。不過台灣的民主轉型有一個特點，它不是透過革命式的斷裂，而是透過長期、逐步的改革完成的。從 1980 年代開始，很多制度與憲政條文是慢慢調整，而不是推翻整個體制。因此，今天台灣仍然保留了一些過去政治文化與制度的遺緒。

舉個例子，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時，教育一直告訴我們「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當年台灣在聯合國安理會也代表中國，還有很多國家承認中華民國。1971 年之後，情勢逐漸改變，北京取代了這個位置。但對於在那種政治社會化環境下長大的人來說，要完全改變身分認同其實並不容易。台灣後來出現本土政治力量，例如民進黨，但在這之間還有一段過渡時期，例如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政權。當時並沒有完全推翻體制，而是在既有架構下逐步改革，使台灣走向民主。很多今天仍然存在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其實都與這種漸進式轉型有關。

第二點是關於現在的政治困境。今天很多人問，為什麼政府不採取更強的措施，例如在國安、反滲透或反間諜方面立法。其實相關法律早就存在，但當初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妥協下通過的結果，因此條文相對模糊、處罰也不夠嚴格。很多案件最後判得很輕，這也讓執法單位感到挫折。



現在的情況是，執政黨在立法院沒有多數，國民黨與其他政黨聯手形成微弱多數，很多政策因此被阻擋。總統賴清德是一個立場相對堅定的人，但在民主政治中，很多時候仍然需要妥協，但那是他的作風。

不過我也想說，這並不代表事情完全沒有進展。我相信美國方面其實正在做一些努力，例如透過 AIT 與部分國民黨政治人物保持溝通，尋找願意合作的對象。換句話說，在台灣內部政治光譜中，也可能出現新的調整。這些過程都還在發展中，所以我想說的是，請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 **Taiwan: A Strategic Pivot in Indo-Pacific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1:00-2:00pm Discussion between Dr. Diamond, Adm. Ellis, and President Tien

2:00-2:30pm Moderated Q&A with Audience

我方田弘茂院長：

我認為，美國國會這些年其實一直在持續向台灣社會釋放支持與保證的訊號。整體而言，國會對台灣的立場是相當明確的，也願意在很多議題上協助台灣。但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中，真正決定政策方向的仍然是行政部門，而不是國會。因此，白宮與國務院在實際政策上，未必會完全按照國會的建議行動。這就形成了一種微妙的不確定性。

一方面，我們曾經聽到美國總統多次表示，如果台灣遭到攻擊，美國會出手協助；但另一方面，也曾聽到領導人說與習近平是很好的朋友。這樣的訊號有時會讓外界感到矛盾。從政治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有些學者主張，美國應該讓立場更加清楚。例如日本近年的討論就提出，如果台海發生衝突，那將直接關係到日本的安全。相較之下，美國作為全球主要強權，其實更有能力做出更明確的政治表態，讓台灣社會理解，在最壞情況下，美國不會讓台灣單獨面對壓力。

另外一個層面是安全合作，例如國防能力建設、情報合作等。美國近年其實已經在加強這方面的合作，但仍然還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最後一點比較敏感。美國其實一直很謹慎，不太願意直接介入台灣的內部政治。但現在似乎開始出現一些變化，也就是透過不同方式釋放訊號：對於明確支持美國與民主陣營的政治力量，美國會給予更多支持；相反地，如果某些政治勢力明顯反對美國，甚至傾向支持共同的潛在對手，那麼美國也可能會保持距離。這樣的訊號，長期來看可能會影響台灣內部的政治結構，也可能在未來的選舉中產生一定的效果。

美方 Larry Diamond 提問：

今天早上我們已經談到很多關於宣傳、資訊戰以及內部滲透的威脅，也就是一個潛在對手試圖透過各種方式削弱台灣民主制度的問題。你長期研究民主轉型，也曾經預見並分析過民主化進程，現在同時又在智庫中關注國家安全議題。因此，我很好奇，在台灣目前這樣的情境下，一個民主國家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困境。

一方面，如果一個國家要維持自由民主體制，就必須尊重憲政、法治，以及新聞與言論自由。但另一方面，台灣所面對的對手就在海峽對岸，不僅語言相同，也有深厚的文化與社會連結。一個自由民主體制究竟應該如何有效回應這種滲透與影響？

因此我想進一步請教的是，在維護自由民主價值與保障國家安全之間，界線應該如何劃定？如果一個觀點受到外部敵對勢力影響，但仍然存在於公共討論之中，自由社會是否應該容忍？還是民主體制必須採取更積極的防禦措施來避免被顛覆？在台灣這樣特殊的安全環境下，你會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平衡？

我方田弘茂院長回覆：

我認為，台灣目前面對的挑戰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其實是所有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就像美國、英國或歐洲國家一樣，是一個開放社會。我們重視人權、法治，也強調言論自由與程序正義。在這樣的制度下，政府很難輕易對個人採取強硬措施，必須先證明其違法行為。因此，在面對來自外部敵對勢力的滲透、宣傳或破壞活動時，民主國家往往都會面臨制度上的限制。這並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冷戰時期，美國與歐洲同樣曾經面對蘇聯的滲透；今天，許多國家也在處理來自中國的影響力操作。換句話說，開放社會本身就使民主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受到滲透。

但第二個層面是台灣特有的情況。台灣社會在歷史與社會結構上，本來就與中國存在深厚連結。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時，有約兩百萬人隨政權來到台灣。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後代，在文化、家庭與社會關係上仍然與中國保持某種連結。因此，台灣社會本身在兩岸關係問題上，一開始就存在不同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差異。

此外，兩岸之間還存在高度的經濟互賴。從1990年代到本世紀初，台灣社會普遍相信中國市場具有巨大的經濟機會，許多企業大量投資中國。同時，在美國與西方學界也曾流行一種觀點，認為透過經濟發展與中產階級的形成，可以逐漸促使中國政治制度走向改革。因此，當時不少人主張透過經濟合作與接觸來改變中國。但事後回頭看，這種期待未必實現。

因此，台灣今天面臨的困境同時也包含歷史、認同與經濟互賴所形成的特殊結構。這使得台灣在處理來自中國的影響力與壓力時，比其他民主國家更加複雜。

美方 James Ellis 評論：

今天早上有一個很重要的討論，就是區域局勢其實已經出現很大變化。你剛才提到日本的轉變，從安倍晉三到現在的新領導人，對台海與區域安全的表態都比過去更明確；菲律賓在杜特蒂下台、馬可仕上任後，政策方向也明顯調整；美國與台灣的夥伴關係，仍然是台灣安全與區域穩定的重要支柱。

在這樣的背景下，接下來川普與習近平即將舉行峰會。我想請教的是，如果由你來為美方擬定對中談話重點，你認為哪些議題最應該被納入？美國應該如何表達，才能一方面避免被視為過度挑釁，另一方面又能清楚釋放必要訊號，強化台海和平解決的可能性，並維持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穩定與繁榮？

換句話說，雖然台灣無法直接坐上談判桌，但也不能在這場對話中被邊緣化。因此，我真正想問的是：從你的角度看，美方在這場川習會中最應該傳達哪些核心訊息。

我方田弘茂院長回覆：

如果只是討論原則性的方向，我想多數美國領導人應該都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問題不在目標，而是在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

我的看法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歷來並不會尊重一個軟弱的對手。如果一方缺乏實力，或沒有對方真正需要的籌碼，那麼北京很少會做出實質讓步。歷史上其實已經多次證明這一點。例如國民黨過去多次與中共合作或談判，但最後往往失敗。因此，如果希望維持台海和平，前提其實是建立足夠的實力與籌碼。

對台灣來說，唯一能讓兩岸出現有意義對話的條件，就是自身必須足夠強大。這種實力不只是軍事，也包括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面向。只有當對方清楚知道，一旦採取武力行動所付出的代價將非常高、甚至難以承受時，嚇阻才會真正發揮作用。

至於所謂的「現狀」，其實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現狀本身一直在變化，只是變化的內容與方向不同。台灣目前的策略，其實就是在強化自身的內部實力，包括經濟、科技、國防等各個領域，讓這種和平的現狀能夠持續維持下去。

美方提問：

我想針對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請教你。剛才你提到「矽盾」、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美國政府對台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

最近有一些新的政策訊號。例如，美國商務部長 Howard Lutnick 表示，希望美國未來能自行生產約 40% 的高階半導體。同時，川普政府內部也曾提出，如果台灣希望美國持續提供安



全保障，就應該大幅增加向美國採購軍備，甚至有大約一千億美元軍購的說法。某種程度上，這被外界解讀為台灣需要為自身安全付出更多成本。

另外，美國也提出一個時間框架，希望在 2028 年前達到這個半導體產能目標。如果這個目標真的實現，那麼過去常說的「矽盾」概念，可能就會變得沒有那麼牢固。換句話說，如果美國對台灣半導體的依賴下降，那麼在安全危機出現時，美國是否仍然會像現在一樣強烈介入，也就成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因此我想更直接地請教：面對這些來自美國政府的政策訊號，台灣目前是如何看待的？台灣政府或戰略社群是否正在思考一些調整或因應措施，以降低這些變化可能帶來的風險？

我方田弘茂院長回覆：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而且確實非常及時。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台灣的領導層其實完全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過，這個問題又回到了我們剛才談到的一個核心結構：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如果要增加支出，尤其是像國防預算這樣的大筆資金，最終仍然需要立法院的批准。

目前的困境在於，最近一次選舉之後，執政黨在立法院失去了多數席次。這種情況在美國、韓國或歐洲民主國家其實也常見，但它確實會影響政策推動。例如，賴清德政府提出增加國防支出，但在立法院遭到反對黨的阻擋。因此，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政府缺乏意願，而是民主制度下的立法程序造成的政治僵局。

不過，我認為這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問題。相關討論仍然在進行中，未來仍有可能找到政治上的折衷方案。台灣政府其實非常清楚一件事：在尋求美國或日本協助之前，台灣必須先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與能力。因此政府已經提出長期目標，到 2030 年將國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以台灣目前的經濟規模來說，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投入。

事實上，台灣的經濟狀況並不差。去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達到約 8.6%，是亞洲最高之一，今年預計仍有約 4% 的成長。政府財政也相對穩健，外債很低，外匯存底則相當充足。因此從資源角度來看，台灣其實有能力增加國防投資。

同時，台灣在全球科技產業中也具有非常關鍵的地位。台灣擁有完整的半導體與 AI 供應鏈生態系。未來，台灣希望能利用這些產業能力，一方面強化自身安全，同時也為美國、日本等合作夥伴提供必要的技術與供應鏈支持。

美方 David Fedor 提問：

幾年前我們在胡佛研究所做過一個半導體供應鏈的研究，當時提出「矽三角」(Silicon Triangle) 的概念，三個頂點分別是美國、台灣與中國。那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的三角結構問



題。不過今天你也提到另一個正在形成的新三角關係，也就是印太地區逐漸成形的美國、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戰略互動，而日本本身也正在發生重要變化。

因此我想請教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如果今天你是台灣的外交部長，在外交上與日本深化合作時，你最優先的議題會是什麼？台灣希望在安全、經濟或科技等哪些領域與日本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同時，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促進這種合作？外界有時會懷疑川普政府對多邊合作的態度，但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美國希望自己的盟友與夥伴能夠更加強大、更加自立。既然你剛才也提到自我防衛與自我強化的重要性，那麼從美國的政策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如何幫助台灣與日本在今天的情勢下建立更強的合作關係？

我方田弘茂院長回覆：

如果談到美國、台灣與日本的合作，我認為可以從產業與戰略兩個層面來看。日本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業國家，早在二戰前就具備先進製造與軍工能力。雖然戰後因憲法限制，軍事發展受到約束，但日本的產業與科技基礎仍然非常雄厚。對美國而言，美日同盟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安全合作關係之一，而隨著印太地區的重要性上升，這個同盟只會變得更關鍵。

在高科技產業上，台灣、日本與美國其實形成互補結構。台灣在晶片製造上具有優勢，日本掌握許多關鍵半導體材料與設備，而美國則在核心技術與市場上居於領導地位。因此，如果要建立高科技或戰略合作架構，更合理的組合其實是「美國、台灣、日本」，而不是把中國納入其中。

目前的政治時機其實也相當有利。日本政府對美國與台灣都相對友好，如果三方能加強合作，不論在半導體、AI 或國防產業上，都有可能在未來十年主導全球高科技發展。

美方提問：

我想請教一個關於「軟實力」的問題。台灣政府在政策上是否有推動相關策略，例如鼓勵文化、媒體或產業投資，以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民眾之中的形象與支持度？

例如南韓就透過「韓流」取得很大的成功，像 K-pop、韓劇等文化產品，讓美國與世界各地的年輕世代對南韓產生高度好感與文化認同。那麼台灣是否也有類似的政策或策略，希望透過文化、娛樂或創意產業來提升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與理解？

我方田弘茂院長回覆：

其實我們曾經和南韓的智庫有過對話，他們也曾經問過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台灣在美國國會得到的支持，似乎比南韓還要多？這某種程度上其實與你剛才的問題是相反的。

如果要解釋其中原因，我認為台灣與美國之間其實一直存在非常深厚的人才與社會連結。例如在某個時期，台灣內閣成員中大約有八成擁有美國的高等學位，即使到今天，每一屆政府也通常有超過一半的部會首長曾在美國受過高等教育，其中很多都是博士。因此，台灣菁英階層長期與美國社會、教育體系與價值觀有密切連結。

所以問題其實不在於台灣與美國之間缺乏交流。相反地，台灣與美國之間的人才、教育與社會網絡其實非常緊密。從這個角度看，台灣與南韓在與美國的社會與價值連結上，其實是相當接近的。

當然，南韓透過流行文化建立了很強的國際影響力，例如 K-pop 或韓劇。但如果從整體社會聯繫、價值觀與政治關係來看，我不認為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連結會比南韓弱。事實上，在很多層面上，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一直都相當深厚。

美方評論：

其實台灣在美國已經有不少代表機構，例如舊金山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一直在推動文化交流、教育合作與投資往來等工作。這些機構長期在美國促進雙方的社會與經濟連結。

在學術層面，也有很多類似的努力。例如我們在史丹佛大學的計畫，就是希望讓更多學生接觸台灣。我們透過課程與交流活動介紹台灣，也正在籌備新的台灣研究項目。去年夏天，我和同事帶了大約十六位史丹佛學生到台灣待了將近三週。

我可以很直接地說，大多數美國學生一旦去過台灣，都非常喜歡那裡，甚至不太想離開。有些人還因此學習中文，甚至與台灣建立更深的的生活與情感連結。對很多學生來說，台灣是一個比中國大陸更開放、更容易接觸的華語社會。

所以在我看來，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其實很簡單：就是讓更多美國人去台灣。無論是留學、交流、做研究、經商或文化互動，這些實際的接觸都能自然地加深美國社會對台灣的理解與支持。

美方提問：

我的問題是，剛才你提到台灣必須建立「有效嚇阻能力」，也就是整體提升自身的防衛實力。不過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下，台灣內部正面臨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政治僵局，很多國防與安全相關政策因此難以推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要如何跨越這種政治分歧，讓國家安全政策能夠繼續往前推進？從你的觀察來看，台灣的政治體系是否有可能逐漸走出這種僵局？如果可以，大概需要透過什麼方式或在什麼時間點才可能出現突破？

我方田弘茂院長回覆：

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目前的情況確實不理想，但也沒有外界想像得那麼悲觀。首先要理解的是，國民黨本身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一致的政黨。在對北京或對美國的態度上，國民黨內部其實存在明顯分歧。有些國民黨政治人物長期與美國有密切聯繫，例如在美國受教育、家人在美國生活，甚至持有美國護照，他們與中國並沒有太多經濟或個人利益上的連結。這些人即使與執政黨在政策上有分歧，也不代表他們會犧牲台灣的利益。

因此，台灣目前的情況雖然是政治分極，但並不一定是最嚴重的對立局面。現在立法院的僵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第三政黨與國民黨合作，使執政黨在國會變成少數。不過第三黨只有八席，而且其中不少席次未來兩年內可能會出現變動。如果這些立委中有部分人改變立場，在關鍵議題上支持政府，例如國防預算或重大法案，那麼政府仍然可以順利通過重要政策。

因此，現在就斷定這種僵局會長期持續，其實還太早。政治情勢仍然在變化之中。對台灣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向美國證明一件事：即使面對內部政治競爭，政府仍然有能力在關鍵安全議題上取得政治支持，並推動必要的政策。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台灣仍然可以被視為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整體而言，我對未來的發展是審慎樂觀的。

二、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之反應或評價(請於 250 字內要述)

無

肆、綜合檢討或改進建議：(請於 500 字內要述)

1. 建議在下次預算上能夠充裕、符合申請方的需求外，在「項目」限制上能鬆綁。過去很多時候政府補助金額表面上看起來很多，但是事後都無法核銷，限制很多。
2. 對外工作相當不容易也辛苦，有許多參與的成員老師，都是拜託邀請參加，希望鬆綁「只能坐經濟艙/豪經艙」的限制，因為長途飛行坐久了除了影響體力也會損耗精神，以及，因為買機票住宿都要先自己墊支，希望相關政府單位能提供預支借款，減輕出訪人員的負擔。

伍、活動成果照片：請提供 3 至 5 張彩色照片，解析度為 300ppi 或以上。

1. 國策研究院/ 2026 年 3 月 2 日/ 美國舊金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閉門會議





2. 國策研究院/ 2026 年 3 月 2 日/ James Ellis 教授、Larry Diamond 教授與田院長, 公開論壇



3. 國策研究院/2026年3月2日/國策研究院與美國舊金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晚宴



4. 國策研究院/2026年3月3日/國策研究院與美國舊金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午餐交流



附件一

## 學者摘要與建議

### 陳彥升

在於 INPR-Hoover Institution 學者的交流中，很有趣的是，Dr. Guoguang Wu 提議台灣執政黨，可以考慮讓在野黨中親台的人選，如王金平來擔任閣揆，以促進朝野的合作。我說很意外 Dr. Wu 對台灣政治這麼熟悉（眾人笑），是有創意的想法！

另外，最近的伊朗戰爭過程，讓我們看到對台海安全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美軍在這次的實戰中證明了，中國宣稱已久以東風 21 為主體的 A2/AD (Anti-Access / Aera Denial) 阻止美軍航母戰略，已徹底無效了。這對於東亞區域安全及地緣政治，已產生重大的影響，也讓 Peace through Strength 戰略更加堅實有力。台灣立法院的責任就是要趕快通過國防特別預算，建立強大國防力量，有效嚇阻中國侵台的意圖。

Peace through strength has been the US global policy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 deterrence is the focus of this policy which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Taiwan being at the center of gravity along the first island

chain inevitabl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is region.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clearly more so soon after the visit of the former Speaker of the House Nancy Pelosi to Taiwan in 2022, the PLA of PRC has been conducting their daily grey zone harassment and intimidation towards Taiwan by circling around the island with warships and military planes. The situation has called for Taiwan to boost its defense posture and capabilities that are imperative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asymmetric warfare practices using unmanned systems in huge number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fter seeing their effectivenes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However, the battlefield environment and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its surrounding waters are quite different, direct applications of their experiences won't be effective. For instance, there were many recent instances of intentional sabotage of undersea cables that link Taiwa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hinese researchers have published studies of the utilization of swarms of drone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to jam the communication signals of Starlink. They have also designed a so-called "mothership" drone Jiutian (16-ton class) for the deployment of these swarming drones over the Strait. To maintain Taiwan's communication resilience under these threats, a high-altitude longendurance (HALE) UAV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lso called high altitude pseudo satellite, HAPS, system) is urgently needed. US and Japan can help in this regard. Furthermore, although Taiwan has acquired, developed and deployed substantial defensive capabilities over the years such as Patriot, HIMARS, Harpoon, etc. Costeffective systems for fending off attacks of salvos of rockets and drones a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defending Taiwan. One possible solution to this issue is a defense system like the Iron Dome of Israel. Although indigenous development of such system is likely but the time frame may not be so optimistic. And direct acquisition is perhaps a better alternative if possible.

## 張國城

### 一、致詞及發言主軸

「...各位好。能在胡佛研究所與諸位相聚，我深感榮幸。身為臺灣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經典譯註』計畫的主持人之一，我長期研讀一部堪稱典範的著作：《決策的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今天，能在現場有其傑出作者之一——菲利普·澤利科教授——蒞臨聆聽，既是殊榮，也是一個及時的提醒：面對臺灣海峽，我們必須運用同樣的分析架構。

決策理論的核心教訓在於：理性是相對的。對行動者 A 而言的『理性』，在行動者 B 眼中可能被視為『非理性』。因此，當我們分析 2026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擴張時，必須停止把我們自己的邏輯投射到北京身上；相反地，我們要從其自身的視角——政權存續與歷史使命——去解碼習近平的『戰略自信』。」

## II. 模式一與模式三：領導者的「戰略自信」

「以『模式一』(Model I)的語言來說，中國國家行為彷彿由一個統一、單一的意志所驅動——也就是習的意志。過去一年，他的自信已到達一個轉折點：他相信『東升西降』的趨勢正在加速，也相信解放軍已在第一島鏈取得『系統性超越』(Systemic Overmatch)。」

然而，若套用『模式三』(Model III，官僚政治/組織政治)來看，我們會看到一個危險的回饋迴圈。近期對中央軍委的清洗，剷除了可能提出異議的聲音。當一位領導人的戰略自信高漲，而內部原本用來『制衡』的機制又被清除時，戰略誤判的風險便會急遽上升。習可能相信其『智慧化』(Intelligentized)的軍力已足以完成既成事實，即便地面上的作戰現實未必支持這種判斷。」

## III. 「智能化」賭局

「這種可能的錯置自信，部分來自中國的第十五個五年規劃。北京把賭注幾乎全押在『演算法優勢』上。他們相信，透過 AI 驅動的指管通情(C2)系統，可以把 OODA 循環縮短到一個程度，使美國與盟友的介入在數學意義上變成『來不及』。」

對習而言，只要他相信「『西方決策遲疑』的時間之窗」已經打開，出手就可能是理性的。對他來說，制裁的經濟代價只是次要變數；相較之下，『統一』的歷史必然性才是主變數。這是一種高風險的生存邏輯，而不是以市場成本效益為核心的計算。」

## IV. 結語：改變對方的算式

「因此，臺灣的防衛不只是點算飛彈數量或艦艇艘數；更關乎『認知嚇阻』(Cognitive Deterrence)。我們必須在習的『理性模型』之內運作，讓他清楚看見：任何攻台手段都不會通往『中國的偉大復興』，反而會導向他最恐懼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國內控制的崩解。」

我們的策略，是在他的『戰略自信』之中注入『可計算的不確定性』(Calculated Doubt)。我們必須證明：我們的『決策』更快，我們的『系統』更具韌性，而我們的『意志』不可動搖。

謝謝各位。」

~於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發言開場(中譯)，2026年3月3日

## 二、交流及對話內容整理摘要(會中、私下):

Q1: "You mentioned the recent purges in the CMC. Does this institutional instability actually delay Xi's timeline for a cross-strait unification, or does it accelerate it?"

(你提到軍委整肅，這種制度不穩定會延後還是加速習近平的統一時程?)

A1:

"It's a double-edged sword. While the loss of experienced logistical and technical oversight (especially in the Rocket Force) may degrade operational confidence in the short term, it may paradoxically increase political urgency. Xi is replacing 'professional

skeptics' with 'political loyalists.' This means there are fewer voices in the room to tell him 'we are not ready.' Therefore, the risk of a miscalculated escalation actually rises even if the PLA's objective readiness is temporarily hampered."

Q2: "How effective is the PLA's 'Intelligentization' in a degraded electronic warfare (EW) environment? Can they maintain command and control (C2) if we sever their links?"

(解放軍的「智慧化」在強電磁干擾下有效嗎？如果我們切斷鏈路，他們還能指揮嗎？)

A2 : "That is the critical vulnerability. The PLA's 'System-on-System' warfare relies heavily on centralized data fusion. However, we must notice their recent shift toward 'Edge Computing' in drones and decentralized satellite backups. They are actively rehearsing 'Autonomous Lethality'—training systems to operate under pre-set mission orders even when disconnected from Beijing. Our goal should be to inject 'algorithmic doubt' rather than just cutting the cord."

Q3: "Given the current economic slowdown in China, is the PLA's 15th Five-Year Plan (2026-2030) fiscally sustainable?"

A3:"History shows that for the CCP, regime survival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lways trump GDP growth. We see a 'War Economy' pivot: while consumer spending lags, state investment in dual-use technologies—semiconductors, aerospace, and AI—remains shielded. They are transitioning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ey might build fewer hulls, but those hulls will be more lethal and integrated. We cannot rely on their economic cooling to provide a 'defense holiday' for the West. Xi's confidence is rooted in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genuinely believes the West is in a state of terminal systemic decay. This is not just propaganda; it informs his risk calculus. He sees the current window of opportunity as a strategic imperative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Q4: "How has the 'Ukraine Lessons Learned' modified the PLA's approach to a potential blockade or invasion of Taiwan?"

(烏克蘭戰爭的教訓如何改變了解放軍對台封鎖或進攻的策略？)

A4 : "The PLA has learned two primary lessons: First, speed is everything. They want to avoid a 'grinding' war by using overwhelming 'Intelligentized' strikes to decapitate leadership within days. Second, sanction-proofing. We see China aggressively stockpiling grain, energy, and parts. Their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Force' is now focused on sustaining high-intensity combat without reliance on global supply chains—preparing for a 'Fortress country' scenario that Russia failed to build."

Q5: "With the U.S. diversifying its footprint in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does the PLA still believe it can achieve '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

(隨著美軍在菲、日的佈署多樣化，解放軍仍認為能實現 A2/AD 嗎?)

A5: "They are shifting from a 'Wall' concept to a 'Web' concept. Instead of just trying to keep the U.S. out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ey are using 'Cognitive Warfare' and maritime militias to make the cost of entry politically unpalatable for U.S. allies. They believe that if they can hold our forward bases at risk with high-volume, low-cost missile salvos, they can fracture the political will of the alliance before a single shot is fired."

Q6: China's shipbuilding capacity(中國的造船能力)?

A6: "Beyond ideological confidence, there is a tangible, industrial foundation to Xi's calculus: China's shipbuilding dominance. Today, China accounts for nearly 50% of global commercial shipbuilding. This isn't just an economic statistic; it is a massive 'Training and Sustainability Engine' for the PLA Navy.

- Capacity for Attrition: While the U.S. struggles with maintenance backlogs, China's dual-use shipyards allow them to rotate hulls for training and repairs at a tempo we simply cannot match.
- The Training Feedback Loop: More hulls mean more 'Blue Water' hours for their officers. They are no longer a 'Green Water' navy learning to sail; they are a battleforce practicing complex, multi-carrier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Process' (Model II), the PLA's ability to standardize ship designs and rapidly iterate hardware means their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 are evolving faster than our procurement cycles. For Xi Jinping, this industrial capacity acts as a 'Strategic Safety Net', convincing him that China can out-produce and out-last any Western intervention in a protracted conflict.

Quantity has a quality of its own. With more hulls available for constant exercises in the Philippine Sea and beyond, the PLA is rapidly closing the 'Experience Gap.' Their shipbuilding lead allows them to fail, learn, and iterate in real-time. This reduces the 'Friction' (in Clausewitzian terms) that Xi might otherwise fear, further inflating his strategic confidence."

Q7: "In the context of deeper U.S.-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how can we address concerns regarding institutional infiltration and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ing loyalties of Taiwan military officers during a high-intensity crisis?"

(在美台加強安全合作的背景下，我們應如何應對高強度危機期間，關於制度性滲透與潛在「忠誠衝突」的疑慮?)

A7: "To counter these internal vulnerabiliti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Lai Ching-te is actively pursuing a multi-layered strategy of 'National Resilience.' This is not merely a military buildup, but a profound effort to address the legacies of Taiwan's past. The strategy focuses on three critical pillars:

- Strengthening Taiwanese Identity: By reinforcing a distinct national narrative, the government aims to heal the 'Identity Dissonance' left by decades of traditional pro-China education, ensuring that defense is seen as a protection of our own democracy, not an extension of a civil war.
- Elevating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Through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pay, better housing, and improved social status for service members, the goal is to transform the military into a career that attracts the best of the 'Democratic Generation.'
- Counter-Intelligence & Legal Deterrence: Recognizing the threat of infiltration, the government is strictly enforcing anti-espionage laws and imposing severe penalties for those who compromise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l III (Governmental Politics), these reforms are essential to ensuring that our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are not just technically sound, but politically loyal. We are proving to Xi Jinping that the 'Soft Path' to China's victory through infiltration is being closed."